

大論教育了富裕中农



大辯論教育了富裕中农

——記北京郊区几个富裕中农的思想轉變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內容提要

1957年下半年，北京郊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次以批判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采取了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形式，它不仅教育了富裕中农，也教育了广大农民，大大地巩固了合作化制度。本書收集了八个富裕中农思想轉变的材料，其中六个都是經過大辯論才轉变过来的。本書的“前言”对这几个材料作了一些分析。

大辯論教育了富裕中农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15/16 字數：37,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書号：3071·48 定价：(5) 0.15元

前　　言

1957年8月到12月，在北京郊区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以部分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坚定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有些因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而受到批判的富裕中农也开始有了好的转变。这本小册子就收集了北京郊区八个富裕中农思想转变的材料。其中有六个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很大转变的富裕中农；有两个是一直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富裕中农。

我們从这些材料里能看出一些什么問題呢？

首先，通过尤起、黃貴山、李士忠等六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的活动和大鳴大放时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言论，可以看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的。尤起等人就代表了富裕中农阶层中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动摇性比较大甚至反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等基本政策的少数人。由于他们在入社前一般都是经济力量较强、生产资料较多、发财思想较严重，因而入社后处处感到不舒服，总希望合作社垮台，至少是自己退社单干。他们一遇机会就宣传单干的“优越性”，抓住合作社的某些个别缺点加以宣扬、夸大，进行攻击。在行动上，他们带

头闊自留地，不好好在合作社里干活，出去搞“自摟”。有的勾結小商販搞投機活動，帶頭隱瞞產量和私分產品，少數人甚至強拉已入社的牲口、農具，破壞合作社的生產。他們的這種資本主義言行，對合作社的鞏固與發展起了極其不好的影響，有些地方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北京市南苑區西紅門鄉在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查出，在全社（一鄉一社）十六個生產隊中，有九個生產隊在富裕中農和少數壞分子的帶動下，私分了土豆二十五萬斤；有些鄉在少數富裕中農的影響下，多留自留地的人占全體社員的半數以上，嚴重地影響了社員的出勤率和合作社的生產。更為嚴重的是，少數干部由於其家庭經濟條件的變化或受了資本主义思想的侵蝕，在合作社的管理上實際執行了資本主義的路線：有的占國家的便宜自肥，有的不執行與國家簽訂的合同，不執行國家的政策，甚至把統購物資在自由市場上出售，借以牟利。顯然，這種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如果不堅決制止，合作社就不能鞏固，社會主義在農村就不可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此，開展一次以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义思想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十分必要、十分迫切的了。

其次，從這幾個人的身上，我們也可以充分地看到團結、教育、改造中農的政策的正確性。這一政策是從中農（包括富裕中農）這一階層的實際狀況出發的。千百年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至今還有廣大的思想陣地，這是與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相矛盾的；但是，他們又是勞動者，因此絕大部分可以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實際生活的體驗和

党的教育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

这几个人的思想变化过程也說明了，为了达到巩固地團結中农的目的，就必须对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們所說的團結只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下达到的，而不是同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傾向和平共处，無原則地迁就。如果像这次运动前那样，听任少数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自由泛濫，放任他們搞資本主义活动，不仅达不到團結中农的目的，反而会影响整个富裕中农以及部分下中农和貧农。

再次，从这几个富裕中农的思想轉变过程中，也可以得出与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一些初步經驗。除了在总的方面我們必須坚持摆事实、講道理、进行說理斗争，反对任何簡單粗暴的作法外，还必須通过群众的回忆、对比，用具体事实向他們講清兩個方面的道理：一个是講清資本主义是使少数人發財、多数人貧困的道路，是为广大群众所不允许的，是走不通的；另一个是通过几年来合作社在發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大量事实，并結合全国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宣傳，來說明合作社的無比优越性，指出合作化的美好远景，增加他們的信心。事實証明，绝大部分富裕中农，在基本上弄清了这两个問題之后，是会开始对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采取較为現實的态度的。这本書里的黃貴山、李士忠、李明俊就是很好的例子。

最后，从这几个受到批判后有了轉变的富裕中农的思想狀況中，仍旧可以看出，兩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中还没有結束。这首先是由于合作社建立时间还不久，在生产水平和收

入水平等方面暫時還沒有超過絕大部分富裕中农。因此，一些資本主义思想比較严重的富裕中农，通过运动的教育，虽然已有所轉变，但是有些人也还多少有些勉强，有些人無可奈何的消極情緒還比較大。像黃貴山所說的“房有千間住一間，財过北斗端一碗”的思想，就是这种無可奈何情緒的很好寫照。显然，一旦遇有适合的气候和土壤或是我們放松了对資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資本主义的死灰还会首先在这些人的身上复燃。因此，我們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决不能因为經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麻痹起来。相反，应当时刻警惕地注视农村中各阶層的政治動向，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取得社会主义在广大农村中的徹底胜利。

1958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道路走对了.....	宋紹綸 (1)
——記富裕中农高殿勛積極走合作化道路的經過	
就得走这条光明大道.....	辜 堅 (7)
——記富裕中农苏炳元入社前后	
大辯論挽救了我.....	郭福長 (14)
——記富裕中农李明俊的思想轉变	
这回我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李如昆 (25)
——記富裕中农尤起的思想轉变	
幸亏你們这回帮助了我.....	邵 煒 (30)
——記富裕中农黃貴山的思想轉变	
这回是思想上入了社.....	王庆功 張炳勛 (37)
——記富裕中农李士忠的思想轉变	
不能翻身忘本.....	王之礼 邢連剛 (44)
——記富裕中农于守德的思想轉变	
一个“缺糧戶”的秘密.....	謝 鵬 (50)
——記富裕中农陸文山的思想轉变	

道路走对了

——記富裕中农高殿勛積極走合作化道路的經過

高殿勛住在北京昌平区松蘭堡乡同心社滿井村，今年已經五十多岁了。他是解放后發展起来的富裕中农。到1953年，他家的生活水平已經大大地超过了当地一般农民，这一年中，他的收入达一万多塊錢，三头五里地的乡亲們，沒有不知道滿井村高家的。可是在党的教育和总路綫的鼓舞下，他坚决地抛弃了資本主义道路。1954年，他带头組織了初級社，1956年參加了高級社。虽然他的收入減少了，但他沒有怨言，为了大家富裕，入社以后反而感到精神愉快。社員都說：“高殿勛的道路走对了！”他是富裕中农堅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例子。

受尽了艱難困苦

这是二十年前的話了。当时高殿勛剛剛二十多岁，就負担着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家中除祖遺的十一亩地和几間破旧的土房外，还有兩头牲口，一个翻瓦車，每年若是不种地主几十亩租子地，这生活簡直沒法維持。1939年，他种了路庄地主路景春二十多亩租子地，东摘西借地湊了兩千多斤糧食；租来的地本来想着秋后多打点糧食，可是誰知道，一場大水，庄稼連影子都找不見了，只有几片高崗地，打了十几

石粮食，家里把这点粮食看成眼珠似的，省吃儉用，連糠帶菜地总算渡过来了。1940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又要葬送，又要租地，又要修房，花錢的事都赶在一塊，沒办法，就从朋友李志文家偷偷地借来了一千多斤粮食，家里的人都鬧得沒精打采，叫他卖地还賬。当时他想，卖了地就置不回来了，以后就更沒办法了，所以就和家中說，不要紧，咱們吃点糠菜，苦日子就能熬过来。真的就在这几年里，他整天赶着牲口給別人帮套、运粪，白天黑夜地干着。他老婆整天到地里挖野菜，采树叶，为了多掙几个錢，他們真是三、兩个月長在地里。寒冬別人还在被窩里睡觉，可是他早已送了六、七趟粪。一个破旧的小棉襖，蔽不住寒，冻得直打哆嗦。在夏天，不管泥水和日晒，也不休息一天，卖的是苦力，可是回到家中只吃几碗菜叶粥。这样苦干了兩年多，总算把賬还上了；真是一掏窟窿（即借債）十年穷，借了一次錢，好長時間都緩不过气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統治时期，他的生活更苦。日本投降后，人們都想着該过上几天享福的日子啦，誰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殘暴地压迫着广大劳动人民。他这回清楚了，要生活就要斗争。他在1945年东摘西借，拴了一挂車，除了拉买卖就帮助八路軍搞运输，因为这个，他被拘留过兩次，要不是花錢买动，真有生命危險。在斗争中，殿勛受到了党的教育。

剛剛走入了歧途

解放了，土地还了家，他分到了十一亩地。他想，这回該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啦。他的生活提高得很快，拴大車搞运

輸，每天都收入不少的錢，又置农具，又添衣裳，全家人都
是喜气洋洋的，可是他腦子里那股子怕受穷的勁头总也轉不
过弯来。1950年，他就借了三千来斤玉米，从路庄村王海那
里买了一輛汽輪車，1951年又置了十四亩地，到1953年真是
他大發財源的一年，春天他打了兩個新上車，后来又花一千
三百元买了四条新輪胎，又換了兩個新驟子，兩個大車搞運
輸，又拉沙子，又运貨，每月收入不下一千塊錢。父子兩個人
在外掙錢，生活十分闊氣，抽的总是前門烟，下飯館總得
炒几个菜，喝点酒。家中也是一样，米面足吃，要买什么都是
財大气粗的。这个时候，什么过去受苦，吃糠咽菜，都忘到九宵云外了，掙了錢只顧吃穿，還給孩子买手表和自行車。
为了發財致富，他又耗費了一番腦子，他不滿足現有的
这兩挂車，从春天就准备拴三挂，2月里雇了一个車把式，
7月里又雇上一个。他想，將來讓兒子和兩個車把式一个人
赶一輛，他在家里就打扫打扫場院，喂喂牲口，支配一下活
茬，当个業主，也就成了。事实也是这样，从雇了人以后，
高殿勛就沒有参加过劳动，那种克勤克儉的生活，已經远远
地离开了他的家庭。

原来事情办糟了

1953年秋收后的一天，村上通知高殿勛去沙河小区參加
會議，他正在打悶雷，不知道是开的什么会。到那里以后，
才知道是貫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別人都是喜欢得了不得，可是他的思想里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斗争
开了。他听到上級講的句句都有道理，感到自己确是走上了

死路，越听越难过，越發感到自己的事情办糟了。回到家里，躺在炕上，說什么也睡不着，他翻来复去地想，解放前自己所受过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生活，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与今天的幸福生活成了鮮明的对比。他又想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正是剝削雇工、个人發財的地主富农的老路。他想，^②总路綫是个灯塔，是条光明的路綫，农民要走集体的道路，靠劳动吃飯，可是我还雇了把式，这不是开倒車嗎？这簡直是忘了本了，我錯了，我應該回过头来。經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兒子商量，把兩個雇了几个月的車把式都辞掉了，过了几天又把一輛車也卖掉了。鄰居高殿倉見他卖車，就問他：“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好好的日子还不过？”高殿勛好意地回答他：“冒尖就要开倒車，好好劳动生活，不是也能过得很好嗎？”卖車以后，他和过去一样参加了生产劳动。这一年里，兒子赶着一个車，他自己在家中劳动，收入也不少，光粮食就收了三十多石。1954年秋天，他从区里参加会议回来就組織了一个初級社。他带头把牲畜、大車入了社，还动员了富裕中农刘振生等三个大車戶也入了社。二十四戶（七戶中农）的小社办得挺好，他当社長，对工作很認真，經常工作到深夜。为了使社能够增产，他可沒少卖力气，自己积肥，还动员社員多积肥。他投資的肥料就有十二万斤，在社里数第一。春耕播种的时候，为了保証播种用肥，他自己拿出了一百二十元，从清河买回了二十多車羊糞，每亩施肥达到三千多斤，还施了兩次追肥。庄稼長得綠油油的，秋收时計算了一下，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了三百斤，比一般單干戶增产百分之二十五。本

村的富裕中农郑连登想跟合作社比粗，这回失败了。组织起来后第一炮打响了，村中的人都信服高殿勋有两下子。这一年他收入也合五百多块钱。当别人问他入社怎么样，他说很好，收入虽没有过去多，但是过去的收入里边有剥削来的，现在的收入，是正大光明的劳动换来的。悶葫蘆里的谜彻底揭开了，这一年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他的道路走得对

高级合作化以后，大家都要选高殿勋当大队长。他想：自己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哪能领导一百多户的生产队，这么大的事应该叫党员领导。再三推让给张庭俊（党员），他也积极地参加了劳动。1957年开春，他一直干了两个多月的耕地活茬，后来又撒种，又锄地，别看他年老了，什么活也能拿起来，劳动使他变得更加健壮结实了。1957年9月，村上开展了大辩论，要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感到应该这样作，有些人就是跟合作社不是一条心，还想拆社会主义的牆脚，这回得把他们扳过来。10月6日，他参加了和富裕中农郑文启进行辩论的会议。当他听到郑文启说合作化不好时，他简直坐也坐不住了，向前对着郑文启说：“说话不要没有良心，解放后你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想一想，解放前你家吃什么？现在你家吃什么？要想自己发财，那可办不到。要发财，我的条件比你强，1953年我有两挂汽轮车，每天收入不少，当时我准备拴三挂车，把式都雇好了，可是后来我感到这样作错了，自己冒了尖，就得有人受穷，后来我入了初级社，我个人虽然收入减少了，可是二十四户的生活都提高

了，大家都富裕了。咱們大伙如果都是一条心，还愁过不上好日子嗎？不要再打自己的如意算盤，还是回过头来吧。”会場上的人，都感到他說得对。中农刁富接过來說：“这才是社会主义思想，郑文啓想自己發財，所以說合作化不好，想去單干。”郑文啓在大家帮助下終於承認了錯誤。

辯論虽然过去了，但是高殿勛的这一片話，在社員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他現在又被选为队委委员，生产勁头更足了。为了爭取1958年農業丰收，支援水利建設，在社里召开兴修水利的会上，他就报名投資一百元，并积极参加了挖渠工作。

（宋紹綸）

就得走这条光明大道

——記富裕中农苏炳元入社前后

在北京郊区衙门口村上街，一提起富裕中农苏炳元来，许多人都說：“挺积极！人家办小社时就入社了，带头卖余粮，社里讓干什么就干什么，还当了三年生产組長，是有心走合作化道兒的人！”

走上了剝削人的岔道

很早以前，苏炳元家里很穷，他爹佃了四亩地，打下粮食不够吃，便靠打短工、拉駱駝过日子。住的是破土房，穿的是破衣裳，一年也吃不上几頓帶肉味的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家貧穷人不想过好日子啊！苏炳元的爹为了讓兒子長大往高处攀，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地攢下錢來讓兒子上学。誰知道到第四年上，他爹有了病，挑不起一家人的生活，十四岁的苏炳元只得放下書本，出去拉駱駝，打短工。兒子知道爹爹的心意，苏炳元从打娶了媳妇以后，就一心往高攀，决心要攢錢置地买牲口。他披星戴月地拉着駱駝从京西矿区把煤驮到丰台去卖，来回一整夜帶一个半天，第二天傍晚到家，只迷糊一会儿，啃点窝头，又去驮煤。他媳妇在家侍弄着孩子，黑夜还点着灯，背着筐到街上去捡粪。到夏天駱駝歇伏时节，一家人还帮人打青草，卖青菜，有时候还

到城里拉洋車，到磨坊當磨工。這樣苦干了十來年，蘇炳元已經陸續置了兩亩一塊、三亩一塊的“豆腐地”十多亩，還買了一個牲口和兩個駱駝。蘇炳元的兒子也漸漸長大了，結了婚，夫妻倆便帶着兒子、兒媳婦勤千儉用，生活漸漸好了起來。

一山不如一山高，到了這山还想上那山。蘇炳元夫妻倆看見別人拉煤能摻假，一車煤賣兩車煤的價，心里很羨慕。他們又想法攢錢買大車，做投機买卖。有一年，他們用打下來的糧食跟人換了一輛舊大車，再一年，他們又卖掉駱駝，加上糧食買來一輛鋼板大車。蘇炳元自己眼神不濟，就讓兒子趕鋼板大車，雇個把式趕那輛舊大車，一天拉着几千斤煤進城。他們在煤底下墊點青灰，秤上再耍點花招，錢掙得快，地也置得多。在1948年國民黨軍隊潰退的時候，他拉煤的投機买卖搞得更欢。这一年，蘇炳元用投機得來的錢一下子置了二十六亩地，買了兩個牲口。這時候，他們家已經有了七十來亩地，三個牲口，兩輛大車，攀上了剝削人的岔道。

一場虛惊

解放以後，黨和政府關心人民的生活，在農村頭一件事就是實行土地改革。衙門口村的農民也在1949年卷入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

1949年初的一天，蘇炳元從城里拉煤回來，把“要實行土地改革”的消息告訴老伴，老伴着急地說：“這怎麼辦呢？共產黨要‘共產’，早知道還不如不置那麼些地呢！”兩口子合計了一個晚上，決定把地推出一部分。他們給親家撥了幾亩地，

又給近鄰几亩地，還說：“地白种不要租。”他推出了三十多亩，还剩下四十多亩。

衙門口村的农会成立起来了。苏炳元夫妻俩的心里七上八下。苏炳元的兒媳妇王桂荣常受婆婆的气，土改工作组的干部，动员她出去工作，苏炳元夫妇为了讓兒媳妇在外工作探听点風声，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王桂荣在外听到的一些事情，回来后都告訴他們了。有一次听说土改要划成分，可是过了兩個多月，別家的成分都已經划好了，唯独苏炳元家一点动静都沒有。有时候，苏炳元的老婆在地里干活，也听到左鄰右舍这样說：“你还拾掇这地哪！明年怕不由你家种了吧？”她一听，心里更慌，回去告訴了苏炳元，又埋怨老头兒不該置那么多东西。有一次，农会开会，沒讓已經到会的王桂荣参加，王桂荣哭哭啼啼地回了家。苏炳元老婆着急地說：“坏了，坏了！准把我們家划成地主了，連开会都不讓我們參加！”說着說着又埋怨起老头兒来了。苏炳元这些天进城时挺注意瞧报，知道一些土地改革的政策，这时就劝老伴說：“共产党不会杀地主。划成地主就地主，頂多把那几十亩地分了，我們能干活，有吃喝就得！”

政府經過研究，考慮到苏炳元新置的二十六亩地还没有种；家里有四个劳动力，只帶輕微剥削，就划定他家是富裕中农。本着團結中农的原則，苏炳元家的土地和牲口一概不动。苏炳元老兩口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他的兒媳妇王桂荣跟老头兒說：“共产党真公平！咱們家靠劳动吃飯，研究了兩個多月，給咱們評了个中农！”老兩口聊起八路軍买粮食給錢、待人和气等事，又聊起了解放后不派車、不收杂税等事，